第七章
拥抱革命

败战后，小林正树受到美国军方的拘留，在冲绳服了一年的劳役。225 当他终于被遣返之后，眼前的政治景象让他大吃一惊。他回忆说，“日本变得极端民主化，每个人都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每个人都奔向民主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与组织活动。”小林正树，后来成了一名卓越的反战的、人道主义的电影导演，他对日本人这种突发的拥抱民主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疑虑。他评论说：“这种盲目因袭的态度，看上去就跟战前一样，只是那个时候人们是热烈地追随军部。我并不认为日本人的意识的变化必然是恶的，而是变化的方式有问题。”[1]

从不同的角度，吉田茂也表达了对“民主革命”深刻的保留态度。强硬的、能讲英语的吉田茂，在战后不久担任了日本外务大臣和盟军最高司令官的主席联络担当官。1946 年到 1947 年间，吉田茂曾经组织了一届不幸的联合内阁，1948 年下半年，他又以更为稳定的权力基础和效率，重掌首相之职。由于在占领期说过的一句保守主义者的名言，吉田茂获得的名声比他掌权的时间更为长久。这句妙语是，吉田茂一旦想到盟军总司令部（GHQ），他心中的念头都是：“快点回国去吧（Go Home Quickly）！”[2]

与吉田茂的愿望相反，美国人继续留驻日本。而且与吉田茂的预期 226 相反，他和他的保守派同僚们发现，彻底取消改革议程也是不可能的。新殖民主义的革命，确实强制日本的统治机构引入了进步的改革，并且以制度固定下来。即使保守派和进步派都在怀疑，民众力量却因为占领军的民主化政策得到解放，表现得活力旺盛、多姿多彩、不屈不挠，甚

至有些激进。尽管吉田茂直到1954年末都在执政，并且为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复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在回顾自己的政绩时却心怀懊悔。吉田茂在评述他的内阁无可避免地默认改革议程时说："我自忖曾有这样的想法：无论需要修改什么，等到日本恢复独立之后都能改正。然而一旦事情已经决定，想改变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3]

拥抱最高司令官

小林正树所担忧的、外国人所嘲讽的"顺从的畜群"的心态，用日本人的话说，更像是个褒义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个大多数人赖以生存或者根基所在的地方，这种顺应大势的态度完全是"淳风美俗"。一种强烈的对上下等级和自身地位的敏感，是这种意识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全部。顺应意识，还应该指向一个由价值、行为和象征构建起来的令人熟悉而且感觉舒适的文化世界。被盟军总司令部禁止的日之丸和国歌，就是与这个"淳风美俗"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还有村祭、盆踊、传统的婚丧仪式、感伤的流行歌曲、茶道、武道、孝行、勤勉、对长者的敬意、女性的美德、对"义理"与"人情"间纠葛的传奇美化，外表和"面子"的顾虑以及对"和"的尊重等等。对天皇感伤而卑屈的态度，就是这种民众意识的一部分。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质疑过度西化或过分无为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健全的民众精神。[4]

当获悉这种态度和习惯可能会妨碍某些计划中的改革时，一位盟军总司令部的科长回应说："让他们改变社会习俗好了。"[5] 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更大的问题是，需要何其广泛地改变"社会习俗"，才能为胜利者自上而下的革命打好真正的草根基础。正如学者日高六郎所言，尽管这种"古老的意识"看起来对民主化而言，并不一定特别适合，但是它也不是天生就反动到不可救药。结果是，对胜利者和他们政策自发的民众响应，要比任何人预料的更加充满活力，在意识形态上也更加暧昧不明。

这一点，戏剧化地反映在直接寄给麦克阿瑟将军或者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民众来信中。在整个占领时期，每天都有数百封的民众来信，尽管有些涉及有组织的请愿或是写信活动，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通信都被占领军人员阅读和分析过。许多信件被

翻译，或者至少概括成英文，而最终有三千到四千封信进入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个人档案。被普通日本人热诚欢迎的总司令对和平与民主的乐观精神，相当部分可能就是来源于阅读这些不寻常的（并且被仔细筛选过的）信件。

这一通信事件有一个短暂的序曲。1945 年 8 月 31 日，在对麦克阿瑟抵达日本进行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的同时，东久迩首相的言论几乎引起了同等的关注。东久迩敦促他的同胞，通过直接给他本人写信，表达他们的希望和关注的问题。尽管这是政府为了平息怒火、抑止抗议的措施的一部分，然而却是对民众意见空前的征求活动。数天之内，每天有四五十封信和明信片直接寄到首相官邸。10 月 1 日，据《每日新闻》报道，信件最高达到了每天 1371 封。

1948 年，当麦克阿瑟被作为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选美国总统时，许多日本人，包括这家乐观地起名为“瞬间建筑社”的老板，抓住时机表达他们对最高司令官及其政策的爱戴。

10月5日，东久迩内阁的倒台，阻断了涌向首相的信件洪流，但是信件的洪流本身并未停息。相反，它很快直接涌向了最高司令官和他的班子。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记录，并没有统计占领第一年收到的信件情况，当时的信件数量最为庞大。据官方记录，从1946年9月到1951年5月，同盟国翻译通译局（ATIS）阅读并处理了441161封信函和明信片。这些信件来自各行各业，有些是用英语写成，绝大部分是用日语写就。大多数来信者都具名，而且写得感情热烈。袖井林二郎教授对一些通信样本进行了意味深长的编辑和分析，评价说这是历史上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无与伦比的交流。最终，自发的来信者，约占到日本成年人口的0.75%。[6]

当最高司令官审阅这些通信时，确实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因为写信者都满怀崇敬，而且信中充满对他的慷慨大度的各式各样的感谢。致信者颂扬他“神一般高尚的仁慈”，并且称呼他是“活着的救世主”。青森县的一位老人来信说，他每日早晚都膜拜麦克阿瑟的肖像，就像他以前膜拜天皇的神像一样。神户地区的一个地方文化协会，制作了一幅日式风格的“基督山上垂训图”，呈献给麦克阿瑟，并且附信说将军的领导，就如同画上庄严神圣的时刻。[7]麦克阿瑟被颂扬有佛祖般的慈悲心肠，被比作孔子《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他因为从战争的梦魇中解放了日本人民而备受崇拜，由于为外国占领下心怀忐忑的国民带来希望和幸福，而受到顶礼膜拜。[8]普通男女向他忏悔自己过去军国主义的罪孽，仿佛他是牧师一般。他们向麦克阿瑟吐露心底最深切的恐惧和希望，仿佛是面对心理医生。他们将麦克阿瑟视为这些年来一个伟大的、变幻莫测的词汇——“爱”的化身。他们的信一再地谈到和平与民主，仿佛这两个词汇本身就是护身符，会带来好运。最高司令官可能会由于他令人敬畏的权力，而被人与天皇相提并论。然而，显然他被认为更平易近人，更可能直接拉近关系。这对于许诺民主愿景的独裁主义统治来说是自相矛盾，同时也是挑战。

麦克阿瑟还收到许多礼物，他往往都欣然受之。尽管向长者或是恩人送礼是日本的传统习俗，但是向这位外国大君主进贡的数量，远远超出从前军部高官们收受的赠礼。有些赠品质朴而迷人。一位渔夫在1948年仲夏的暑热中写信给麦克阿瑟说，他一直冥思苦想如何向将军表达衷

心的感激之情："由于你卓越的思想和才能"，才使日本人有可能达成"甚至是长年血战都不可能实现的成就"。在信的结尾，渔夫自忖他所能做的，只有分享他所知道的最棒的美味——鲇鱼。他以捕鱼为生，现在正是鲇鱼"最肥美"的季节。渔夫盼望着收到回信，以便麦克阿瑟何时方便跟他一起捕鲇鱼并且同尝美味。与此相比，献给麦克阿瑟的最精心、最正式的礼物，是一套手工的织锦和服与腰带。从1946年11月起，刺绣匠人独自在京都的下鸭神社内，穷三年之功完成了这件作品。他每日祈祷，最终织了七千万针完成了他的杰作。这次，随礼物附上了神道的祈祷文，"作为我们七千万国民纯洁的心的象征"，献给麦克阿瑟将军。显然，织物的每一针就代表着一个日本人。[9]

在活蹦乱跳的鲇鱼与奢华绚丽的织锦缎的映衬之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和邀请函向最高司令官涌来。他收到过玩偶、灯具、陶器、漆器、竹制品、古书、书籍、盆栽、盆景、动物毛皮、铠甲、刀剑，还有绘画和雕塑，有时包括他个人的肖像或者雕像。当占领开始时，麦克阿瑟65岁了，他的年纪不仅为他增添了贤者的光环，而且使来信的人们都真诚惦念他的健康长寿。他收到了数不清的藤条和手

1951年1月，为庆祝麦克阿瑟71岁寿辰，神奈川县的官员和士绅，站在以县民的名义献上的半身铜像前。将军收到的礼物不计其数。

杖，还有一条束腹带。人们送来当令的水果和鲜花，还有各种各样的吃食：蘑菇、茶、小豆、莲藕、山芋、腌鲑鱼、风干栗子、大豆、蜂蜜、稻米和年糕。

231 一位日本面包师乞求准许前往，为最高司令官烤制生日蛋糕，他的请求被接受了。日本北海道的一群原住民阿伊努人，捕杀了一头鹿，向麦克阿瑟献上鹿皮和鹿茸，“作为对他为我们国民保卫疆土，并给日本带来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上的民主社会的感激之情的象征”。一打活的母鸡被送来了，成了“大使馆农场”的一部分。一只头上羽毛有黑色十字架纹样的金丝雀，被作为吉祥的礼物送来了。两卷制作于1935年的挂轴，据说是用汉字草书写就的整本《圣经》，也被作为礼物送上。一位因新宪法颁布而欣喜不已的国民，寄给将军一把扇子，他用蝇头小字将整部《宪法》写在了扇子的正反面。一位10岁的少年，天天给美国种子繁育的南瓜记生长记录，并为麦克阿瑟将军手抄了一份。他父亲画了一幅成熟了的南瓜的油画，他母亲写了信，全家人一起表示谢意。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礼物都是对最高司令官感激之情的朴素表达，并不是在纯粹的日本社会关系中，准备特定赠仪精心表达互惠与信赖的意思，也不像是日本皇家或者政界、财界的名人，向麦克阿瑟及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官员赠送礼物，背后有着精明的政治考虑。[10]

大多数寄给麦克阿瑟及其司令部的信函、明信片与陈情书，除表达来信者的希望之外，也写下了他们关心的具体问题。半数以上的信件，涉及家人或熟人的海外遣返问题。许多信件关注特定的经济问题和政策。一少部分然而百分比惊人的直接寄给总司令部的信件中，涉及指认写信人确信应当被逮捕、肃清甚至是应当作为战争罪犯受到审判的人。当地居民揭发在战争中压制民众的官员。高中生和大学生指责军国主义的教师。前帝国军人自发揭露曾经虐待盟军战俘的人员。某些组织，包括宗教派别，被指责为助纣为虐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告发他人不仅包括过去的行为，还延伸到了现在的问题。他们抱怨对地方警察行动的不满，揭发与囤积居奇、黑市买卖、贪污腐败和暴力行为有关者的姓名。未按照盟军最高司令官命令上交私藏家传刀剑的人遭到举报，怀有“反

232 美”或“反民主”情绪者被告发。如果仅凭这些无情的信件推断，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昨天爱国的日本人，现在变成了向占领军告密

的眼线。另一类令人吃惊的信件，是迫切要求日本被吞并，或者成为美国的永久殖民地。一些这样的来信者断言，否则民主改革将很快破灭。[11]

有时候情形看起来并不美妙。一位 ATIS 的翻译，是祖籍冲绳的日裔美国人，他告诉袖井教授，阅读这样的信件，真的使他轻蔑日本人。许多人觉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风向标，随风倒。然而，他们也倒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千百万人愿意向新的当权者公开表达他们观点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尽管来信通常对占领政策表示支持，这些普通民众也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许多来信都恳求保护天皇。少数信件写的是血书，或者至少摁上了血手印。更少数的人，建议废除天皇制。一位来信者写道，天皇是日本最大的利己主义者。另一位断言，天皇是个“吸血鬼”。一位小学教师直率地抱怨说，审判战犯，暴露出美国明目张胆的双重标准。一位极度怨恨的来信者说，审判无论如何都不过分，他相信至少有十万军国主义分子应当被处以绞刑。一位警察认为，应当仅限于清查先前的特别高等警察（思想警察）的高官。相反，另一位来信者敦促，对公务员的清查，应当扩大到市、町首脑一级。旧地主阶层，公开非难最高司令官的土地改革没收土地充公的本质。有些人建议，改革议程应当在地方一级更加积极有力地推行。赞同占领当局理念的人，认为有必要注意美军的暴行。一位贫穷妇女鼓起勇气向最高司令官抱怨：不间断地飞往美国的航班，在她们居住区的上空飞过，噪音带来的恐怖的空袭记忆，都快把她逼疯了。有些写信者的确疯狂，比如一位艺术家，他献给麦克阿瑟一幅描绘了耶稣、圣诞老人、天狗和山林小妖精的共同特征的绘画。还有些再清楚不过的马屁精或是心术不正的家伙。毕竟这一信件的洪流，至少树立起又一个以自我表现的新方式，填充不寻常的战败“空间”的活力榜样。

这些信也暗示了占领的潜在的——有时也不那么隐蔽的——性的 233
维度。正如美国本身一样，麦克阿瑟被日本男女民众认为是虽然宽大却占据优势的男性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具有启蒙精神的《朝日新闻》，也以某种天主教式的说法，称麦克阿瑟为“我们的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也分享了这种男性的身份。在写给最高司令官与总司令部的信中，不难分辨出那种持久的依赖心理。而许多写信者显然分不清楚接受麦克

阿瑟、接受家长制的权威与接受民主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最露骨的是一些女性写给麦克阿瑟的独特来信，被困惑的专家们分析为“我想给你生孩子”的类型。在这里，拥抱征服者的愿望，如果不能在现实中达成，至少是在字面上实现了。[12]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与普通民众的这些时常很不成熟的自我表达相对照，知识分子对战败的反应，则是以明显的理论思考展开的。尽管内部存在许多冲突的差异性，但是知识阶层少有例外地采取了“进步的文化人”的姿态，并且在民主与解放的大旗下重新集结起来。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丸山真男，唤起了对他与他的同行们特异身份的关注。“进步的文化人”不仅是一种新的提法，而且在日本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反动的文化人”或者“中立的文化人”的相对应的说法。[13]在这个时代做一名受人尊重的知识者，就需要成为一名民主革命的传道者。

这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次戏剧性的转变，因为他们之中曾经反战的仅是凤毛麟角。尽管占领当局对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清洗，最终只涉及数百名学者和作家，但是事实上到 1930 年代中期，战前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无论如何，他们支持过战争。[14]为数不多的几百名共产党员拒绝脱党变节，继续保持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在狱中，偶尔是在苏联或者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在战争年代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潮流冲昏头脑，声望大增，比如经济学家有沢広巳与大内兵卫。1930 年代后期，有沢和大内因为左翼思想被帝国大学开除。与在德国坚持原则、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左翼人士、教会人员和军官们相比，同时期的日本并没有对应者。实际上，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前，日本知识分子的作为鲜有值得称道之处。

对许多受到“淳风美俗”教化的普通日本人而言，投降之后突然出现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许多其他公众人物对民主与非军事化胜利滔滔不绝的赞美，带有伪善和投机主义的意味。“进步的知识人”显然对他们新的激进主义有不同的讲述。他们不无道理地强调说，这表现了 1920

日本政府对征服者的欢迎仪式，有时看起来就像是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歌剧。上图为 1947 年日本艺伎欢迎在环游世界飞行途中降落在横田空军基地的美军飞机。

年代后期与 1930 年代早期受到镇压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复苏。然而除此之外，许多知识分子进步与激进的政治实践，反映出后来丸山真男所谓的“悔恨共同体”形成的特征。

对许多像丸山真男这样的学者和文化人而言，战败与被占领，包含着对未来欣喜的期待，还掺杂着对过去深深的悔恨，一种政治上和智识 235
上的解放感，伴随着未能抵制哄诱、未能反抗可怕的国家权力的良心自责。在知识阶层中间，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就这样彻底地与悔恨和自我批评纠缠在了一起。无论集体或个人，许多人公开忏悔他们未能坚持立场、反对镇压和侵略的罪责。正如丸山真男所言，他们决意重新开始，并且将占领军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对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自发的拥抱。[15]

无论在智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马克思主义都对悔恨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魅力，甚至是对像丸山真男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折衷取舍欧洲的知性传统，并且与共产党人保持一定距离。对大多数进步的文化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与“科学”的框架，看起来通过运用封建主义的残余、资本主义的矛盾、虚伪意识和统治阶级阴谋的观点，就能够深入洞察并且阐释近期的这场灾难。这与美国关于

1952 年初，日本女性表演传统舞蹈，欢迎载有美军家属的舰船抵达横滨港。

236 日本“战争意志”的结构分析一致，并且给出了更为准确和公式化的见解。马克思主义也支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战争暴露出明治“革命”的不完善性，而战败和盟军对日本的解放，无疑加速了向民主的、最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转变。

对战争最有原则的抵抗，来自于执著的共产主义者，这一事实使得战后这些共产主义者具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当德田球一与其他数百名共产主义者从狱中获释，他们成了这个旧日英雄形象皆轰然倒塌的社会里，一夜成名的英雄。同样，1946 年 1 月野坂参三从中国归来，吸引了大批民众。他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据说甚至有保守派们参加。数月之内，野坂就在占领军主导下实施的战后第一次总选举中当选为国会议员。战败赋予了这些共产主义领导人超凡魅力，使他们沐浴在高洁和敏锐的政治性的光辉之中。基于同样的原因，战败帮助确立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自身成为明确的、现世的、普遍的理论源泉，超越了帝国主义国家破坏性的、排他的价值。

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人们都以某种形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了战败初期日本社会景观的生动特色，并且使大多数占领政策的美国规划者们惊诧不已。他们未曾料到，拥有特权的整个知识阶层有如此强烈的热情，

会尝试推进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界限的革命。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人追求更为激进的解放，结果陷入了论争的泥潭，但是许多人超越了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提出根本性的问题："近代的自己"、"近代的自我"或者"近代人之确立"。这些问题被认为是任何真正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他们热心主张，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或者"自律的主体性"，就不可能期待个人与国家对立，保护民主的价值。既然日本文化未能确立起自律的近代自我的典范，知识分子便转向欧洲、俄国和苏联，以及美国，寻求可资效仿的个人和理念。[16]

日本在寻求"近代的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中，可谓屡受创伤：承认自己的失败经验，否定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向本身实行压制、资本主义和战争行为的西洋世界找寻效仿的典范。纵然如此，对于悔恨的知识阶级而言，外国的效仿对象依然有无穷魅力。在不同程度上，许多普通民众也感受到了这种魅力，同样分享了这种坚定不移走向"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的陶醉之感。然而正如常见的情形，知识分子本身唤起了对他们世界大同的激进主义与那种安于现状的平民情绪之间出现的鸿沟的注意。一位显而易见的"进步文化人"清水几太郎，批评有关战败的论著，总是趋向于"或多或少以社会科学为立论基础，并且传达出'万事现在皆能解决'的乐观主义的基调"。在清水几太郎看来，普通读者通常会感到与这些认识大有距离，而且对罪与责问题的认识更加矛盾。[17]

无论他们的象牙塔看起来距离老百姓多么遥远，知识分子对社会却是影响深远。许多战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包括享有盛誉的有沢広巳与大内兵卫，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运作。劳资关系研究的顶尖专家也是如此，例如未来的东京大学校长大河内一男。战后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最激烈的学术论争，是在战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争的两个主导学派所建立的基础上展开的。整个学术体系，比如权威的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向全国的优秀学生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古典派经济学、新古典派经济学折衷混合的教育。[18]

在自然科学界，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等研究者和理论家，在诸如"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这样的新组织中变得十分活跃。这一组织的成员，致力于利用科学达成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目标。此协会宣称，"研究并且普及对民众有用的真正的科学"，"竭诚协助国民诸斗争。全

国民众正热切期盼这样的协助”。几乎在立刻之间，科学家们开始出版诸如《我们的科学》和《民主主义的科学》这样的读本，向更为广泛的大众开展普及教育。[19]

文艺界也刮过“革命”意识的狂风。最著名的事件是，1945 年末，大约一百位作家在东京有名的神田书店街集会，宣布“新日本文学会”
238 的成立。许多著名作家都是发起人之一，而且他们立即制定出激进的活动方针。新日本文学会的宗旨是“团结所有民主主义的文学者，为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奋斗”。它清楚地强调，曾经与“帝国主义战争”积极协作的作家不受欢迎。组织者邀请了 322 位政治审查过关的作家入会，其中有 173 人同意入会。

这些作家想象“民主主义文学”本质上应当是国际性的，尤其是应当对这些年来受到日本侵害的中国和韩国民众作出回应。新日本文学会发行的月刊《新日本文学》的创刊号，成了“8 月 15 日的记录”特辑。在稍后的一期上，批评家小田切秀雄宣称，25 位著名作家负有“战争罪责”，引起了大骚动。其他的新文学杂志也参与了揭露和批判。例如，1946 年间，《文学时评》开设了一个固定专栏《文学界的纠弹》，致力于揭发著名文学家的战争责任。像中野重治这样的著名作家，率直表达了在外国占领体制下利用既存的国家机构进行统治以期实现革命转变的困难，但是仍然对民主基本框架的确立与新的“民众文化”的形成抱有乐观态度。[20]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迎来了严肃出版物的复兴。“悔恨共同体”的世界大同主义的倾向，在出版者匆忙推出的外国著作的广泛性上反映出来。仅试举一例，在新创刊的杂志《世界》的早期刊号上，就宣传介绍过包括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巴尔扎克、纪德、马尔罗、法郎士、司汤达、柏拉图、康德、斯宾诺莎、卢梭、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宾格勒，以及其他许多作者在内的新版和重新发行的旧版译著。以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在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且由此受益良多的日本知性传统的公共议论场域中重新登场。

知识界对战败与民主化反应的多样性和热情，远远超出英美“旧日的日本派”所能相信的限度。实际上，这些专家们的表现，跟一小撮日

本的“老自由主义者”没什么两样，日本的老自由主义者们曾被期望对民主改革积极协助，但是他们的通常所为却如同吉田茂一般，并非如此。这些专家对日本知识阶级的构成、他们的个人背景与学术背景，以及他们对战败和解放可能的反应都毫无头绪。在这一点上，为战后政策引入更为激进路线的非专家们，以他们对民主改革的“普遍”魅力的更加抽象和意识形态化的假想，倒是与日本知识界同气相求。

然而，即便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也未能预见，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会深受“悔恨共同体”感情的影响，也许他们会发现欧洲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对重新定义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如此关键。同样也没有人真正预料到，知识分子的思考，如此迅速地通过媒体渗透到了广泛的民众中间。这种“进步的”知识人的热情超出了美国的预期，并且与美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行为大相径庭。占领当局因而也做出了回应。当总司令部中更为激进的改革论者培育并且支持左翼知识分子之时，警惕的反共主义者却将左翼知识分子打入黑名单并且等待时机，直到冷战情绪使得总司令部内部的改革论者不再信赖他们。

239

草根的参与

更为教条主义的左翼观点在心理上认为，全体日本国民确实必须经由他们指导，才能实现民主革命。这一左翼的或曰共产主义的前卫观念，建立在民众是落后的并且需要指导的前提之上。在这一点上，左翼精英主义者与征服者，或者想要在天皇的庇护和光环之下保持权力的保守派，没有多大差别。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不情愿附和麦克阿瑟的改革议程的日本保守派势力、“进步的文化人”以及日本共产党，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天皇制民主的实践者。

谈到知识者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事实上悔恨共同体有其特定的天然的心理成因。正是因为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战前的变节以及对军国主义的迎合有罪，所以他们通常抱着决不重蹈覆辙的忠诚信念，来对待战后要求与党中央委员会的见解保持严格一致的共产党。像麦克阿瑟及其总司令部一样，共产党坚决要求党员无条件服从本党民主革命的正确路线。这种纪律性压制了党内批评，并且将许多悔恨共同体的知识者变成了新的教条和权威的信奉者。[21]

240 尽管左翼有关辩证法否定与矛盾的言说，可能会使普通民众敬而远之或者昏昏欲睡，但是知识分子倡导解放和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见解，的确引起了民众意识与文化的共鸣。全国性报纸的读者来信，反映出全国性的对“民主化”意义的关注。占领初期《朝日新闻》的一封读者来信，经常被后来的著述所引用。这封信暗示了当外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将他们在东京上流社会不可能见识到的日本民众当作“顺从的畜群”不屑一顾时，他们对日本现实的理解是多么荒谬不实。信的内容如下：

> 看样子美、英、中、苏四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强烈希望日本成为民主国家。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人类理想主义的解放，那么没有人会反对。然而问题是，作为一个有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和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将会有什么样的民主形态。
>
> 仅略观美国和英国的政治体制就可看出，有不同的民主形式是不可否认的。这也适用于苏联和中国。因而，主持占领事务的美国瞄准事事遵从美式民主的目标并非好事。
>
> 必须承认，甚至是日本的封建领导者，也不会单靠封建性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也会考虑到日本国情的发展，并适应形势做出调整。很可能只视美式民主为民主的美国的好意，会将日本引入不幸的境地。我们已经受够了言论桎梏的束缚，如果在摆脱旧枷锁的同时，又加上了美国式的新桎梏，日本将会十分可悲。这样的担心也许太婆婆妈妈，但是我希望能促成各位有识之士对此的思考。[22]

一些接受占领军改革议程的日本人，严厉批判他们的日本同胞拥抱“民主”时的浅薄姿态。有名的佛教禅宗解说者铃木大拙致信《朝日新闻》，让读者警惕先前支持军国主义的著名佛教领袖，现在突然以民主的传道士自居。[23] 一位家庭妇女来信表示担忧，妇女选举权被赋予得太
241 快，妇女们还不能完全领会它的意义所在。[24] 一位女性作家受到别人奚落，因为她先是对战时的军国主义领导者不吝赞美，然后突然转向去赞扬美国军人。[25] 电台的讽刺节目，用先前战后纸张短缺的笑话，极力讽刺翻新政治招牌的人导致了纸张短缺。一位喜剧演员惊呼，情形如此糟糕，人们在旧的宣扬“八纮一宇”（四海一家）的战时布告的反面，就

刷上了“民主”的标语。[26]

如此之多的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美国的崇拜者以及“和平”与“民主”的使徒。这种仓促转变当然有大量可笑可叹之处。玩世不恭者玩起这种转变的游戏很是拙劣，只是翻新招牌、更换包装，很容易成为讽刺的对象。更麻烦的是，日本民众对胜利者的反应，看起来都有些不可救药的天真、随遇而安或曰浅薄。甚至在遭受原子弹爆炸的长崎，居民们也是带着礼物欢迎第一批美国人的到来。（他们将玻璃匣子盛着的日本偶人，赠给了放射能影响科学调查团的领导者。）稍后他们又协助驻留美军举办了“原爆美人”选美赛。有一套连环漫画，以给两位漫画人物起名“小民主”（与此相反，保守派的语言游戏，则是利用日语的谐音，将 Demo-cracy 变成了“民主一苦”）的方式，欢迎民主的到来。有个请愿团体写信给麦克阿瑟，感谢他为日本带来了民主，并请他命令当地一位颇有资格却不愿参选的公民竞选。[27]

尽管这些插曲很容易被视为民主革命无根无源的证据，但是同样容易注意到的是，持续的、令人着迷的关于“民主的传说”开始出现。媒体不知疲倦地讲述这些生动的事件，使得草根民众思考拥抱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这些故事简直就是喜剧。譬如，一位澡堂老板由于燃料短缺，只能隔天轮流开张男浴室和女浴室。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在男澡堂开张的当天，来了一位老年妇女，她开始更衣并且拒绝出门，因为日本现在男女平等。她通俗泼辣地叫骂着：“你说什么呢！跟过去不一样啦，现在可是男女平等啦！”[28]

有些个人对自己权利的坚持，则不同寻常地严肃认真。战后不久，水户市高等学校的学生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他们联合抵制授课，迫使实行“军国主义的恐吓教育”的校长辞职。在东京，一所高等女校的女学生制造了轰动性的事件。她们公开谴责男校长贪污腐败，并要求课程改革。她们的行动是一种双重挑战：不仅是学生对老师，还有女性对男性的反抗。这一事件带动了多所高校的自发抗议，要求军国主义的学校当局和教师辞职，并且增加学生的权利。1945 年 11 月，东京、京都、名古屋和九州的大学生，开始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奠定了战后学生运动的基础。[29]

1945 年 8 月 25 日，战前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召开会议，检讨运动

方针。一个月后，她们向政府请愿，要求妇女参政权，恰巧是在麦克阿瑟将军颁布这项基本的人权指令之前。11 月的第一周，首个全国性的妇女运动组织成立了。战后消费者运动可以追溯到当年的 10 月 9 日，当时大阪的 15 位妇女成立了“主妇会”，这是大米消费要求的发端。同月，东京警察病院的护士们，成立了最初的女性劳工组织，并且获得增加工资交涉的胜利。1946 年 4 月，首次妇女具有参选权的国会选举举行，有 69 位女性候选人，其中 39 人当选。[30] 10 月，战败后最初的男性工人的自发暴动，发生于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煤矿工人中间，旋即被日本煤炭工人跟进效仿。[31] 自 10 月开始，全国的新闻业界也发生了剧变，普通雇员向高层经营者和编辑者施压，要求他们辞职，以谢战争罪责。在全国的 44 家新闻机构发生了大规模的组织改革，包括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社。[32]

许多新的民主化的尝试是在地方上发生的，并未引起新闻报道的足够重视。例如，1946 年夏天，横滨因为战事中断了五年的夏祭活动恢复，妇女破天荒第一次被准许加入扛抬御舆的行列，从而进入了男性垄

许多日本人热烈拥护最高司令官自上而下的革命。时为 1949 年 1 月总选举，这位女性候选人正在向路边的群众演说，听众中包括许多照看弟妹的儿童。

断的祭祀活动的核心，由此进入了传统上妇女因为被认为身心不洁净而被摒除在外的神道领域。以这样的方式，一向珍视的惯例与过去的“淳风美俗”一起，从社会下层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33] 同时，关于民主革命热烈的草根议论，也在不引人注目的出版物上进行着，如地方报纸、学校校报、企业或社团通讯。大量的政治意见交流活动，也在地方集会、小组座谈等新的美式讨论会以及民意测验中展开。就像《每日新闻》所言，民意测验是“加速新生日本的民主化”的又一途径。在数月之内，人们被征求了从天皇制到町内会等各种问题的意见。然而，他们却从未被问及对占领本身的看法。[34]

收音机也使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达到了新的水平。1946 年 3 月，一般的家庭平均每天收听节目 5 小时，使得无线电波成了至少像报纸铅字一样重要的信息工具和政治化的手段。战争年代曾经饱受争议的一档广播节目《真相箱》，在巅峰时期，每周收到 1000 到 1200 封读者问询信件。人气很高的《放送讨论会》节目，其特色是就特定话题各领域的专家在全国各地巡回，回答听众提出的数以千计的问题。[35]

政治选举的候选人，通常由 NHK 提供广播时间宣传政见。1946 年 4 月总选举前夕，约有两千名候选人利用了这一机会。1949 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揭示，压倒多数的选举权人，都是“通过广播来选择候选人的”。[36] 所有广播节目的新策划中，反响最热烈的是“のど自慢素人音乐会”（“业余歌手音乐会”）。这个节目不太可能带来什么名利，但是它的创办是基于空前的、纯粹的、相当善意的平等精神。在战败之前，普通人能够在国家电台上一展歌喉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参赛者从 4 岁孩童到耄耋老人，都汇集到一起向全国民众展示自己。[37]

这样的草根行动，以进步的知识者所理解的概念来衡量，可能未必是“革命的”，甚至未必是“政治的”，但是它们却悄悄地推翻了旧的等级体制，反映出民众对往往是具有自发创造力的更为开放的社会的接受能力。而谈到拥抱民主的表现，它们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改革的制度化

给最高司令官写信并且参加当地座谈讨论的男女民众，并非是在脱离现实的“真空状态”中谈论和平与民主。他们生活在一个直接触及日

常生活的激烈的制度变革的世界中。旧的法律被废止，包括民法和刑法在内的新的法律被颁布。独裁统治的基础结构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农地改革几乎摧毁了地主与佃农的剥削制度。选举制度改革强化了参众两院制的立法机构的政治权限。宪法修改第一次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提供了甚至比美国宪法更加广泛的人权保障，并且将反对军国主义的理想作为国家宪章的核心。劳动法改革，使劳动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基本权利。教育改革使学校课程自由化，促进了男女同校的平等主义，并且扩大了上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民法典的改革结果，消除了家长制的家族制度的合法基础，并且加强了女性在离婚和继承权等重要领域的地位。

245 这些变革，不仅为民主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舞台，而且使日本人自身参与了建造这一舞台的过程。事实上，所有基本的改革，都是由大批日本的官僚、专家以及外围顾问贯彻执行或者鼓动提议的。他们的努力常常是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日本改革推进派的自发的贡献，可以得到方方面面的证实。例如，监督修订民法典的阿尔弗雷德·欧普勒（Alfred Oppler），放权让日本人自己决定是否完全废止得到法律认可的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家族制度”。欧普勒回忆说，他的部下从未命令或是敦促彻底废除古老的家长制，只是“热切关注日本人如何将其与新的宪法原则相适应。他们做的比我们期望的更彻底”。

与其他占领军官员一样，欧普勒发现，战败的打击刺激了日本人对“根本的价值观的重估”，甚至激起了一种“亵渎先前所崇拜的，崇拜先前所亵渎的”彻底破除旧习的欲望。在占领初期，美国方面的改革热情，与日本方面“开明地容许改革”的积极姿态互为呼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欧普勒与他的同事们宣称，他们“尽最大的努力不把日方命令得团团转，而是与他们平等地一起工作。自由地讨论、相互说服和达成妥协，而不是命令与服从”。[38]

这样的宣言当然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日美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甚至是表面上的自由交换意见，总司令部官员的建议不容忽视的默契也依然存在。然而，就连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这位善于运作“任何命令都不得强制执行”的高手，也承认日本人的积极协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偶尔甚至还超出他们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1945

年12月的《劳动组合法》，第一次使劳动者获得了组织工会、团体交涉和罢工的权利。这一法律的制定，几乎全部是著名法学家末弘严太郎领导的一个特大型咨询委员会的功劳。委员会的构成如下：三位厚生省官员和两位学者组成的作业委员会；包括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德田球一在内的30位成员组成的运营委员会以及代表大学、企业、政党、官员、社会事业家和劳动者的130人构成的全体委员会。同样，1947年9月设置的劳动省，“从一开始，就是日本人自己的规划”。甚至第一饭店的一位女侍应生，也在劳动实践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她成功地建议将战时称为“劳动奖励事务所”的劳动者雇佣机构，变更为“职业安定所”。她与总司令部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确切关系无考，或许不寻根究底就是最明智的做法。[39]

战后有关劳动的立法中，最有进步意义的一桩，是1947年的《劳动基准法》。这部规定劳动条件的法律的制定过程，首先要归功于一位有些不可思议的发起者——昔日的思想警察寺本广作。1946年夏天，寺本未经通报就出现在素不相识的科恩的办公室，带来了一大部劳动保护法案的草稿。原来，寺本广作是厚生省劳动基准课的课长。他和他的部下们已经为这一草案工作数月。这一法案并非总司令部管辖的职责范围，同样它在日本政府的课题中也不占据重要位置。在科恩对这一故事的生动描绘中，《劳动基准法》的制定，成了日本中层官员支持民主化改革的光辉例证。

其实，寺本利用了战后的混乱状况，说服方方面面的实业家、官员和政治家相信，总司令部要求有强力保障工作条件的规定。在这样的掩护下，他和数名部下组成的小小团队，在恢复被军部搁置的战前劳动法规以及详细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规定惯例的基础上，几乎独力起草了全面的劳动保护基准法。直到寺本广作出现在科恩的办公室之前，总司令部对此法案一无所知。然而一旦这位意料之外的主动者取得了占领军劳动局的支持，寺本广作就能够告知日本方面的利害关系者，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赞同附和美国人的愿望。有时候情况很棘手，看起来这游戏就要露馅了，但是最终这个偷偷摸摸的改革者小团体达到了目的。这一法案甚至包括一项女性生理休假的条款，被科恩的“工资与就业条件科”的美国女主管认为是史无前例，有些多余而琐碎。但是条款规定保

留了下来。新基准法的第一条强有力地传达的个人价值观念，成了今日大家公认的民主革命的基础。它宣布，“工作条件，必须满足劳动者作为有价值的人的生活的必要需求”。这似乎并不是人们能够期望从一位昔日的思想警察口中听到的话语。[40]

一方面是命令与“说服”手腕的复杂较量，另一方面则是真诚的合
247 作与自发的协助。这种情形在教育领域尤其突出。直到占领结束，最高统帅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一直严密监视教育领域的民主化推进。结果，文部省从战前的天皇制极端民族主义的严格监督者，变成了战后日本最系统和最热心的“和平与民主”的拥护者之一。没有人翻新招牌比教育家们更为狂热，当然这伴随着文部省内部不绝于耳的责骂之声。在这里，占领当局通过允许自由意见的表达和对真正解放的追求，又一次打开了压抑体制的缺口。这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在可以使用新的教科书之前，学生们一直被要求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检查教科书，并且将所有被认为是赞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不太民主的章节，统统用墨笔涂掉。这种“涂墨”作业，其实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就由日本政府自己开始了。对学生们和老师们来说，这是一项内心感受复杂的任务：既是对昨日的神圣教导的否定仪式，又是对广泛认可之事进行思考批判的实践锻炼。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和叔叔的ゆり・はじめ（由利初），战争结束时才 13 岁，他像许多孩子一样，永远难忘这种“涂墨”的经验。在横滨的家被空袭炸毁之后，由利初被疏散到了乡下，在当地上中学。学校很穷，需要学生自己抄写上课用的国语课本。占领军进驻之后，被认为最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三门功课：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授课中赞扬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被中断授课数月。同时，文部省和出版社正适应时代需求，加紧赶制新课本。其间，由利初被要求将他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国语课本“涂墨”。这种经历令他饱受创伤。被涂黑的课本，让他觉得“反常而怪异”，但是这一插曲留给他持久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而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数十年后，栗田亘回想起同样的经历：“我们将涂黑的书页，对着太阳照，如果还能看出字迹，我们就再涂上一层墨水。那天，我第一次被互不相容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所困扰，从那之后这种感

觉就一直存在。”[41]

激烈的教育民主化运动的要旨，体现在《新教育方针》之中，1946 248
年5月由文部省颁布。多位学者应召起草原文，然后由文部省整理简化，颁发给全国的教育者。此方针声明，新制度的目的，是为建设“民主和平的文化国家”做贡献。为此，发展“教育者之间自律的、合作的态度”就势在必行。基于此精神，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被号召，要对导致战争和国家悲惨现状的社会缺陷进行深刻反省。

《新教育方针》指出，明治时期以来的近代化，注重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但是忽略了其背后的基本精神。日本人“学会了如何使用火车、轮船和电器，却没有充分发展制造出这些器物的科学精神”。同时，战争和战败的发生，是由于日本人没有对“人性、人格和个性”的适当尊重。未能培养出理性的批判精神，导致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而“在此意义上，战争责任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承担，必须为他们的罪行向世界深刻道歉”。谢罪只有通过贯彻执行《波茨坦宣言》和占领军当局的命令而实现，从而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教育者担负着重要职责。《新教育方针》详细阐述了“建设新生日本的根本问题”，教育者的使命共分六章：（一）日本的现状与国民的反省；（二）去除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三）人性、人格和个性的尊重；（四）提高科学水准及哲学的、宗教的教养；（五）彻底的民主主义；（六）建设和平的文化国家与教育者的使命。第七章则详细阐述了教育者的任务：个性尊重的教育、公民教育的振兴、女子教育的提高、科学教养的普及、体育的改善、艺术文化的振兴以及勤劳教育的革新。

尽管许多文部省官员可能是被迫阐明和推进这项改革议程，但是《新教育方针》中贯穿的“反省”（那个年代喜爱使用的词汇）的说法，也带有他们自身思考的启示。比如，此方针提出，日本是个国家，然而并未形成真正的社会。因为日本人对国家秉忠诚之心，懂得如何做好家庭的一员，但是个人的感觉较弱，缺乏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道德。这与 249
当时“进步的文化人”确立自律的主体性的论争相一致。只是在《新教育方针》中，这一表述以更为平实的语言，进入了日本的课堂。[42]

这本占领初期的手册的彻底的改革主义风格，被文部省支持或批准

的其他出版社大批复制，包括学校教科书在内。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少年少女のための民主读本》指出，在当今世界，民主主义的理念超越了政治，延伸到经济和日常生活的领域。学生们被教导，自由应当被尊重，但是要与自私自利相区分。自由必须与责任一起行使。平等是民主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却不应与“同一性”相混淆。平等意味着机会均等。

《少年少女的民主读本》，直率地记述日本的被占领状态。“日本现在促进民主，是因为同盟国的命令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吗?”这是课本上的是非题，以小学生易于理解的话表述出来：“与《波茨坦宣言》相一致，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课本接下来介绍，和平主义，是日本和其他国家促进文明并且成为“学问、艺术和道德”兼备的文化国家的最佳手段。[43] 这与高深的知识分子杂志《世界》在其创刊号上所阐述的思想，并无二致。这毫不奇怪，因为这些新教科书的许多作者，都是自由主义和左翼的学者，他们就是“悔恨共同体”的成员。

几百万学生日常接触这样的思想观念，并且在与他们经历过的军国主义秩序大不相同的、自由洋溢的课堂氛围中吸收这些思想。教师们所受到的战败打击，往往异常惨痛。直到投降的瞬间，他们一直是天皇制正统的教练军人。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告知不但要改变思想，而且还要以过去同样的热情教授新的正统教义。自然，个体的反应千差万别。一些老师通过讽刺挖苦和苦恼的自嘲，用师生间更加民主的交流方式，介绍新的课本内容和思想。有人回忆起他的中学老师说，“我们今天学习什么呢？既然我们有民主，我必须问问你们的意见”。[44] 然而，大多数教师都能很快适应新的境遇。他们中的许多人，面对失败的战争有一种切肤之痛的责任感，因为如此之多的人死去了，白白死去，都是他们的学生。

许多教师心中充溢着对年轻学生死亡的悲痛，常常被自己鼓励他们走上毁灭道路的罪恶感所压倒，因而热心拥护和平与民主的理念。他们新产生的激进主义思想，又被眼前面临的贫困悲惨的生活环境所强化。

教师们大举成立工会组织，似乎是对过去盲目服从国家的弥补，他们普遍采取与国家权力对决的姿态。最强大的教师工会组织——日教组，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到1948年，满怀焦虑的最高统帅部官员，巡回于全国各地的学校之间，消除“红色”运动的影响。[45]

战后初期教育改革的理想主义氛围，在一本1951年出版的、受到高度评价的学生作文集《山びこ学校》（山音学校）中可见一斑。编辑者无着成恭，是山形县一所小型中学20岁出头的年轻教师。这本畅销书收录了43位学生三年间写作的散文、诗和报告。无着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成了著名的师生间理想关系的象征。而他的学生们的作文，成了全国普及“日常生活的作文”的教学运动的著名例证。

作文集出名之后，媒体群集于无着老师的小学校，众口一词地报道那里开明、民主的教学氛围。那里的中学生只有大约10%能够继续升学，但是每个人都赞扬年轻的老师对他们的好奇心与进取精神的培养。这些贫穷的乡村少年和他们的良师益友，感动了整个日本。一位学生后来回忆，当这位新来的老师第一次谈起“现在日本的民主萌芽是从美国借鉴而来，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的时候，他是多么地震动。无着老师对日常生活的作文的重视，是基于他的信仰：教育的目的就是“培育社会变革的力量”。从前的学生回忆说，由于背负着农地改革引发的混乱和严酷的日常生活的重担，当地的学生家长并不总是感激无着老师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对学生和当地民众总体上的影响和冲击，却是长久存在的。[46]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日本教育制度的美国化，从大量新的借词的出现中就可见一斑。カリキュラム（curriculum，课程）、ガイダンス（guidance，指导）、ホーム・ヘーム（home room，本班教室）、ホーム・プロジェクト（home project，家庭作业）、コース・オブ・スタディ（course of study，学习课程）、クラブ・アクティビティ（club activity，社团活动），所有这些混杂的外来词和概念，都成了日本教育界的日常语言。[47] 然而，这些输入词汇不过是新的课堂环境的一小部分，就像正规的学校制度的改革，只是当时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1947年开始，在帮

助成年人“学习民主的意识、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明确目的下，成人教育项目被引入。[48] 更有甚者，伴随理解战败与民主化的新世界的精神而来，数以百计的借用语进入了日本社会，日语的总体性质也发生了永久的变化。

日常语言的革命在日本历史上有两大先例。古代和中世的日本社会，曾经由于采用汉字书写系统以及大规模借用中国的文献和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叶，封建的日本对外实行门户开放，导致另一个贪婪借用知识的时代的到来。这次主要是借用欧洲，还有美国。现在，对外国思想和习惯的第三轮消化吸收又开始了。出版社以其固有的活力，立即着手编写外来的新概念的目录，每年刊行流行新语的解说手册。

通常这些手册都是东拼西凑、编排平庸，涵盖了各个领域，既包括意义重大的词条，也有无足轻重的小词。大众文化领域的美国化，在日本化的英语借词词条中一目了然，如 pinup（招贴），jitterbug（爵士乐迷），boogie woogie（摇摆舞），whodunit（侦探小说）。1948 年的版本包括下面这些重要的英语借词，alibi（借口），“casting vote”（决定票），ecstasy（入迷），scandal（丑闻），up-to-date（最新的），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以及 Amen（阿门），还有 4 个意味深长的俚语词：baloney（胡扯），corny（粗俗），hot（热门），phony（假冒）。“Dark horses”（黑马）不经翻译就直接进入了日语，“ハバ・ハバ”（Hubba-hubba）一词很流行，虽然它的本意是男女之间眉目传情，但在日语中却有了迥然不同的“快点，快点”的意思。

奇异的和制英语新词汇，也不时跃然纸上。マネー・ムーン（Money-moon）就是这样的创造，意思是“以金钱为目的结婚者的蜜月”。英语借词“bestseller”（畅销书）也有一个对应词セックス・セラー（sex seller），指的是色情书籍。新的辛辣的俗谚成语也层出不穷。其中奇妙的“五せる”，即对官员有怀柔意味的“五让”辞曰：“让他们吃，让他们喝，让他们抓钱，让他们抱女人，让他们装腔作势。”这个琅琅上口的俗语，如此不敬而且直白，是对传统的“尊官”说教的露骨讽刺，传达出当日痛快淋漓的打破旧习的风气。

1950 年初的街头风景。有人装扮成漫画人物白朗黛（Blondie）与大梧（Dogwood），为广受欢迎的连环漫画 ***Blondie***（《金发女郎》）的电影版进行宣传。从 1946 年开始到占领期结束，***Blondie*** 一直在全国性报纸上连载，它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推动日本民众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享受的美式“民主”的羡慕方面，其影响难以估量。

这种新语详解手册多数是袖珍版本，携带方便。它们整体上生动地 253
展示了流行的言语是如何被匆忙而又根本性地修订着。读者可以查询大量的借用语、翻译语、日本自造的新语以及复活语（军国主义者禁用语），它们不同程度地捕捉到了变化的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些新语词典中，“Open shop”（自由雇佣企业）、“Closed shop”（工会会员雇佣企业）与“picket”（纠察）、“scab”（工贼），“class consciousness”（阶级意识）与“social revolution”（社会革命），“feminism”（女权主义）与“feminist”（女权主义者），“public opinion”（民意，舆论）与“popular sovereignty”（主权在民），“four freedoms”（四大自由：言论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与“transgression of human rights”（践踏人权）等词汇成对出现。[49]

时髦新词层出不穷的另一面，是先前随处可见的言论和标语口号的蓦然消失，如“八纮一宇”、“报国”等。直到战败，“报国”一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几乎可以跟任何行为沾边，如“产业报国”让人联想起“爱国的产业奉献”，“言论报国”则意味着“为国尽忠的公开言论”等等。现在，“报国”与许多说法一起被悄悄埋葬。不知何故，1948 年的一本新语手册的编辑竟能躲过占领当局的审查，谈到这些战时的常用语，已经“随着广岛和长崎的居民一起”让原子弹炸成了死语废语。编纂者还说，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新词是“民主化”。实际上，“如此民主的状态，如果不穿着民主化的制服，甚至得不到定量配给”。[50]

显然，这些辛辣的时代记录的产生，是“民主化”自身的结果。但是这本身也说明，占领军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制度化，的确存在某些问题。

注释：

1 引自 1994 年 Peter Grilli 制作纪录片 *Music for the Movies*：*Toru Takemitsu*（武满彻）时对小林正树的访谈，参见 Linda Hoaglund 的译文，*Positions* 2. 2（Fall 1994）：pp. 382 – 405。

2 袖井林二郎、竹前荣治编《战后日本の原点——占领史の现在》（东京：悠思社，1992），上卷，p. 184。

3 吉田茂《大矶随想》（东京：雪华社，1962），pp. 42 – 43。亦可参见吉田茂，“Jünen no Ayumi”，《每日新闻》，1955 年 8 月 9 日。以及 J. W. Dower，*Empire and Aftermath*：*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1878 – 1954*（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9），第九章，pp. 305 – 368。

4 以“淳风美俗”意识为核心的战后保守主义的梳理，参见日高六郎《现代イデオロギー》（东京：劲草书房，1960），pp. 229 – 259。

5 Harry Emerson Wilds，*Typhoon in Tokyo*：*The Occupation and Its Aftermath*（New York：Macmillan，1954），p. 19.

6 此处有关日本民众来信的论述，主要是参照袖井林二郎，《拝启マッカーサー元帥样　占领下の日本人の手纸》（东京：大月书店，1985），第一章。同时也参考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信件：“Subject File 1945 – 1952”，Civil Intelligence Section，Security Division，Assistant Chief of Staff，G – 2，RG331（boxes 232 – 236）；以及麦克阿瑟纪念馆（Norfolk，Va.）所藏信件：“Personal Correspondece from Japanese，

Koreans and Others, 1945 – 1950", RG10 (boxes 172 – 174)。关于 1949 年 12 月到 1951 年 6 月间日本民众致信最高统帅部的分析，参见冈本公一、塚原哲也，《占领军への投书に见る占领末期の日本》一文，收入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战后体制の形成》（东京：大月书店，1988），pp. 251 – 274；文中有依据信件主题编制的详细分类（p. 252）。日本民众写给麦克阿瑟的一些早期信件，为当日的美国记者获悉；参见 Richard Lauterbach, "Letters to MacArthur", *Life*, 1946 年 1 月 14 日, pp. 4, 7。

7 参见袖井林二郎前引书，pp. 171，191，261。

8 例如，参见袖井前引书，pp. 84，256。麦克阿瑟收到许多佛教徒的绘画和雕像，描绘其神性、智慧与仁慈。

9 袖井前引书，pp. 49 – 51，174 – 175。

10 关于送给麦克阿瑟的礼物，参见袖井前引书，第七、八章。这些礼物的数量和种类惊人，远远超出了此处所提到的。

11 有关这些来信的详细的分析统计，散见于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情报报告书中，如民间情报局（CIS）的定期刊物 *Occupational Trends: Japan and Korea*；如其中的 no. 25（June 2，1946），pp. 13 – 14。其他类型的信件，还包括表达反共或反朝鲜的情绪；参见前引之冈本、塚原《占领军への投书に见る占领末期の日本》，pp. 258 – 260，266 – 268。

12 此处所举的各种例证，多引自袖井教授的《拝启マッカーサー元帅样》一书。"我想给你生孩子"的归类，出自 Grant Goodman，他当时担任这些信件的译者（袖井前引书，pp. 141 – 142）。

13 丸山真男，《后卫の位置から——〈现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追补》（东京：未来社，1982），pp. 120 – 121。

14 据估计，在受清洗的 20 万人中，仅有 268 名学者与作家；参见袖井前引书，p. 24。

15 参见丸山前引书《后卫の位置から》，pp. 113 – 119。

16 关于"近代的自己"的论争的早期例证，是 1946 年 4 月 1 日《人间》杂志上的讨论，pp. 150 – 166。本书第五章论述夏目漱石、河上肇、三木清、尾崎秀实等人，相当程度上是源于对他们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律的主体性的认识。

17 清水几太郎的评论，见载于《东京新闻》1946 年 4 月 17 日，收入日高六郎前引书，p. 249。

18 关于有沢広巳等人的重要作用，参见 Laura Hein, *Fueling Growth: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Japan*（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有关战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参见 Germaine Hoston, *Marxism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 引自金原左门、竹前荣治编《昭和史・国民の中の波乱と激动の半世纪》（东京：有斐阁选书，1982），p. 290。《我们的科学》等书名，出现在 1946 年 3 月《文学时标》杂志的广告中。

20 《新日本文学》1946 年 3 月号，尤可参见其发刊宣言，pp. 62 – 65；小田切秀雄《文学における战争责任の追及》，《新日本文学》1946 年 5、6 月号，pp. 64 – 65；中野重治《批评の人间性（その二）》，《新日本文学》1947 年 6 月号，pp. 2 – 9；

福岛铸郎《战后杂志发掘》（东京：讲谈社，1985），pp. 110－112；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第7卷，p. 225。末文献下引为 *SNNZ*。

21 丸山真男在《后卫の位置から》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对共产党纪律“教条般的”遵从，是由于战前变节的经历，p. 117。

22《朝日新闻》1945年9月12日。江藤淳曾引用过这封信，参见他对占领的保守的批判著作《忘れたことと忘れさせられたこと》（东京：文艺春秋，1979），pp. 58－59。

23 朝日新闻社编《声》（东京：朝日文库，1984），第一卷，p. 158；这一《朝日新闻》的读者来信选集，下引为《声》。

24《声》，第一卷，pp. 116－117（1945年12月24日）；亦参见 pp. 70，132。

25 读卖新闻大阪社会部编《终战前后》（东京：角川文库，1984），p. 114。

26 平凡社编集部编《昭和世相史　ドキュメント　战后篇》（东京：平凡社，1976），pp. 307－311。总司令部忽略了这个笑话的讽刺意味，竟审查认定此节目是“右翼的”。同样，可参见1946年4月号《人间》杂志对1941年12月8日鼓吹“圣战”者的讽刺，以及对1945年8月15日的“民主”的嘲弄，《昭和世相史》，p. 156。

27 Stafford L. Warren，M. D.，“The Role of Radi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收入 Kenneth D. A. Allen 编，*Radiology in World War II*（Washington，D. C.：Surgeon General's Office，1966）。此书是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U. S. Army in World War II* 系列中的一部，该书第890页有调查团和偶人的合影留念；Joanne Izbicki，“The Shape of Freedom：The Female Body in Post-Surrender Japanese Cinema”，*U. S. -Japan Women's Journal：English Supplement*，12（1997），杂志第109页刊有“原爆美人”选美赛的照片；东京焼け迹闇市を记录する会编《东京闇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1978），p. 137；袖井前引书，pp. 285－286。

28 鹤见俊辅等编《日本の百年》（东京：筑摩书房，1967），第一卷，p. 197。

29 *SNNZ* 7：160，263－264；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　败战と占领》（东京：青木书店，1990），pp. 230－231。

30 *SNNZ* 7：154；《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pp. 231－232。战败之后，内务省的男性官员立即主张引入妇女参政权。这一事例，被认为是当日最少引起日方抵制的改革之一。参见草柳大藏《内务省对占领军》（东京：朝日文库，1987），pp. 40－41；《朝日新闻》1995年5月25日。

31 Joe Moore，*Japanese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1945－1947*（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3），pp. 33－41.

32 前引之《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pp. 263－264。

33 前引之平凡社编集部编《昭和世相史》，p. 266。

34 如参见《每日新闻》的民意测验：1945年11月12日（政府选举），1945年12月23日（町内会），1946年5月27日（新宪法），1946年12月16日（吉田内阁）；以及《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1945年12月5日（农地改革），1945年12月9日（天皇制），1946年8月5日（吉田内阁与政党支持），1946年12月9日（家庭收入与日常开支）。

35 NHK放送文化调查研究所，《GHQ文书による占领期放送史年表》（东京：NHK，1989）。关于每日收听时间，见 p. 25；《真相箱》节目，见 pp. 38，44，47，64，

69，76，78，93，118－119，127；《放送讨论会》，见 pp. 35，65，75，107。亦可参见 Russell Brines，MacArthur's Japan（Philadelphia：Lippincott，1948），pp. 243－246。

36 日本放送协会编《放送夜话（续）·座谈会による放送史》（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70），pp. 85，89。

37 SNNZ 7：201.

38 Alfred C. Oppler，*Legal Reform in Occupied Japan：A Participant Looks Back*（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 116－117，318；还可参见 pp. 74，149，156，172，222，233。

39 Theodore Cohen，*Remaking Jap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New York：Free Press，1987），pp. 100，214－215，236－239.

40 Cohen，pp. 231－233。有关这位日本中层官员（寺本广作）此举的动机，科恩的分析道出了事情的真相。Cohen 总结说，寺本广作“在战争结束数周后，就考虑起草全面的劳动保护法。哪怕当时破败的经济能够承受得住，此事也似乎根本不在日本政府的考虑之列。但是寺本认为那正是时候，当时极端保守派受挫，自由派的雇主明白必须保障工人将来有更好的生活，而许多企业正停工闲置，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使情况更糟糕了。最终，只要我们真的想使日本民主化，寺本就可能得到 SCAP 的支持。这真是深谋远虑”。一位前内务省的“思想警察”竟然怀有如此进步的改革思想，事实上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反常。其实战时的官僚机构中有一批所谓的新官僚，或曰“革新官僚”，他们拥有坚定的改革志向，其中许多人在战后的劳动改革、农地改革、财阀解体、地方自治以及教育改革等领域做出了贡献。他们对劳动政策改革的贡献，参见 Sheldon Garon，“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and Labor Policy in Postwar Jap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3（May 1984）：pp. 446－448；Gardon，*The 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 235－237。更详尽的评述，参见 John W. Dower，“The Useful War”，*Japan in War and Peace：Selected Essay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3），pp. 9－32。

41 参见ゆり·はじめ的文章《教科书の败战体验》，载《思想の科学》1969 年 4 月号；收入《战后体验》（《人生读本》特别号，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1），pp. 39－44；Wataru Kurita（栗田亘），“Making Peace with Hirohito and a Militaristic Past”，*Japan Quarterly* 36（1989），p. 188。日本政府下令从教科书中删除军国主义的内容，始于 1945 年 8 月 26 日；参见 Yoko Hirohashi Thakur，“Textbook Reform in Allied Occupied Japan，1945－1952”（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论文，1990），p. 146。

42 文部省，《新教育指针》（东京：文部省，1946 年 5 月）。此文献之节选，收入海后宗臣、清水几太郎编《战后二十年史　第五卷　教育/社会》（东京：日本评论社，1966），pp. 9－15。本人还要感谢明田川融教授提供给我《新教育指针》的前言与开头章节的副本，他是从曾经担任公立中学教师的祖父的文件中找到上述材料的。在尚未受到美方明显的直接影响之前，日本文部省的战后方针，由新任命的前田多门文相于 1945 年 9 月 15 日颁布。彼方针强调三大目标：护持国体、建设和平国家与发展科学；前引之《战后二十年史　第五卷　教育/社会》，p. 2。对战

后初期教育发展的概述，参见 *SNNZ* 7：298－299。相关的学术著述，多强调日方在战后教育改革中的主动性之重要。参见 Gary H. Tsuchimochi，*Educational Reform in Postwar Japan*；*The 1946 U. S. Educational Mission*（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3）；亦参见 Edward R. Beauchamp 与 James M. Vardaman，Jr. 编，*Japanese Education Since 1945*：*A Documentary Study*（Armonk，N. Y.：M. E. Sharpe，1994）。

43 篠原重利《少年少女のための民主读本》（东京：国民学芸社，1947 年 7 月），pp. 1－32。此文献见于美国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的 Prange Collection 文库。

44 前引之《教科书の败战体验》，p. 43。文学者渡边一夫在 1945 年 9 月 12 日的日记中记录，听说一位小学教师告诉他的学生长大后要当兵向美国人复仇。这位老师教导说，如果美国大兵给他们糖果，他们应当把仇恨埋藏在心里并说“谢谢”；参见串田孙一、二宫敬编《渡边一夫败战日记》（东京：博文馆新社，1995），p. 85。

45 对教师们的反应的总体性批判，参见《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pp. 228－230。

46 左藤藤三郎，《山びこ学校をめぐって——その顷の村と教育》，《历史公论》1977 年 12 月号，pp. 50－56。作为当时对山びこ学校积极反响的例证，可参见《朝日新闻》1951 年 6 月的文章，收入朝日新闻社编《〈周刊朝日〉の昭和史》（东京：朝日新闻社，1989），第 2 卷，pp. 223－238。

47 大阪府编《大阪百年史》（大阪：1968），p. 1257。

48 大阪府编《大阪百年史》（大阪：1968），p. 1260。“成人教育”的释义，参见《现代用语の基础知识　一九四八年》（东京：时局月报社，《自由国民》特别号十四号），p. 134；新ジャーナリズム协会编《时局新语辞典》（东京：精文馆，1949），p. 100。

49《战后の新语解说》（该书出版者不明，出版日期应为 1946 年 11 月，藏于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的审查制度档案中）；前引之《现代用语の基础知识　一九四八年》；《时局新语辞典》；新语研究会编《新语辞典　时の言叶》（东京：テンリュウドウ，1949）；《战后用语辞典》，载《历史公论》1977 年 12 月，pp. 153－168。

50《现代用语の基础知识　一九四八年》编者前言。